

文史资料选编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中央社会主义学院

第二十六辑

纪念“一二·九”运动五十周年特辑

- 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前奏 吴世昌
“一二·九”运动回忆片断 雷洁琼
“一二·九”运动及其余波 陈希
回顾“三·三一”抬棺游行 葛佩琦

★ ★ ★

- 我随溥仪十四年 爱新觉罗·毓琇
我作燕子李三辩护律师的回忆 蔡礼

北 京 出 版 社

K291/

6

文史资料选编

第二十六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北 京 出 版 社

文 史 资 料 选 编

Wenshiziliao Xuanbian

第二十六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崇文门东大街路西6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5印张 211,000字

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4,200

书号: 11071·476 定价: 1.85元



“一二·九”西直门前清华学生代表演讲



“一二·一六”燕京、清华请愿团攻西便门之一幕



(四幅照片均为雷洁琼供稿)

“一二·一六”游行中受伤的学生聂元素



“一二·一六”行进在前门外大街的游行队伍

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十六辑 目 录

纪念“一二·九”运动五十周年

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前奏

——回忆“九·一八”后的学生抗日运动……………吴世昌 (1)

附：有关对日和战问题的通信三件…………… (27)

“一二·九”运动回忆片断……………雷洁琼 (33)

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黄敬同志二三事……………王 林 (38)

“一二·九”运动及其余波……………陈 希 (44)

文立徵烈士的两封信……………文立徵 (86)

《五石斋日记》摘录……………邓之诚遗稿 (92)

一九三六年清华被围记事……………冯友兰 (96)

女二中学生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……………聂元素 (100)

活跃于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的女一中……………耿精一 (106)

回顾“三·三一”抬棺游行……………葛佩琦 (111)

冲破沉寂 奔向斗争洪流

——忆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的北平医学院……………唐 诃 (118)

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的北平师大……………武尚仁 (124)

“一二·一二”示威游行亲历记……………梁建华 (141)

DK65/05

不畏强暴 雪耻救国

- 记“一二·九”时期东北大学女学生……刘宁元 (145)
- 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为东北军输送了新血液……陈大章 (157)
- 投笔从戎卫社稷
- 记北平学联向太原输送革命力量的经过……陈振中 (162)
- 北平晋绥代表团赴绥劳军记……梁寒冰 (166)
- 北平爱国人士的抗日救亡活动……张勃川 (169)

- 我随溥仪十四年……爱新觉罗·毓岳 (171)
- 清宫御寿两膳房遗闻……爱新觉罗·恒兰 (208)
- 记容龄谈西太后轶事……荣 涛 (225)
- 西太后的珍禽——五色鹦鹉……朱海北 (231)

- 舞台生活八十年(下)……侯玉山 (234)

六必居的创建年代及其

- 匾额考……叶祖孚 任志 沈鸿翔 (287)
- 我作燕子李三辩护律师的回忆……蔡 礼 (297)

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前奏

——回忆“九·一八”后的学生抗日运动

吴 世 昌

前 言

今年是“一二·九”运动五十周年。一个政治运动的起来，必有它的前因与后果。影响中国历史的“一二·九”运动亦如是。

现在年纪较大的人有的曾参加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有的虽未参加，却也亲见亲闻这个运动的过程。但欲溯本求源，恐怕知运动前因者就未必如知后果者多了。我在“一二·九”运动前后的十来年中，几乎全部时间生活在北京，切身感受到发生于此次运动之前的“九·一八”事变乃是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，并给当时的北平的政治形势造成重大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。一九三一年，日寇发动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侵占我东三省，以致造成连续十四年的中日战争，中国同胞因之而死亡六千万人，财产之损失更不可数计。可知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实为尔后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直接原因。但现在谈到“一二·九”运

动这一历史事件时，人们很少谈到甚至绝口不谈“九·一八”这回事；仿佛“一二·九”是无因而起的一次学生运动，那就未免太偏颇了。事实真相是：在一九三五年的“一二·九”之前，东三省全部为日军侵占，华北五省闹伪自治，北平的郊外通州已成立了日军保护下的伪政权。中国学生从一九三一年的“九·一八”起，即成立抗日会，组织学生军队，卧轨请愿，数十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到南京要求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。其规模之大，影响之广，是中国历史上学生运动所少见的。“九·一八”所激起的学生运动断断续续，此起彼伏，进行了四年多，乃有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发生。所以，“九·一八”是“一二·九”的前奏；“一二·九”则是整个中国学生救亡运动的一部分。今之青年读者，对“一二·九”也许已经耳熟能详，但如欲了解“一二·九”的全部情况，那就不能只看有关“一二·九”的书而不看有关“九·一八”的书。现在系统地论述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书很少见，如此则“回忆录”一类的材料似可暂承其乏。

回忆录不同于历史，这是显而易见、无须解释的。它不必如编年、列传、大事记等须有一定之体例，可以随回忆所得而有详略、有多少。回忆录可能有误，个人回忆所得又时常挂一漏万，而这所“挂”之“一”，亦难免带有片面性。

我这里所回忆的，虽都有国家大事作框框，有的材料还核对过当时的报刊，但我仍不敢说它完全正确，我只是力求无过。我说这些话，好象预先为自己文过饰非，

但行文的无心之过与有意伪装，读者还是可以看出来。

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是每一个回忆录或别的自传体文章的作者都要碰到的。既是回忆录，自然是自己回忆自己录。如果把自己工作的成果，或为别人公认的优点写出来，那是自己作“广告”，用“文革”的术语，叫作“突出个人”。问题就出在这里，既要写自己的回忆，而又不许“突出”回忆者，那怎么办呢？难道把自己写成一个幽灵，在若明若暗的空间浮动？写回忆录有此困难，写自传尤其如此。因此，有些刊物要我写自传，我只好说：不会突出，敬谢不敏。但，我在燕大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搞学生运动的回忆录，虽然是“回头五十年前事”，我却因为事关国家大事，不便“敬谢”；知我、罪我、笑我、骂我，我也顾不得许多了。

一、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消息传进古都北平

五十四年前，即一九三一年，九月十九日是星期六。这天下午，我手里捧着一个淡青色的汝窑小花瓶，连同刚才在宣外杨梅竹斜街一家小木器作坊里配好的乌木座子，走出街口，正低着头看顾手中的瓷器，却被对面来的一个同学，抓住我的手臂。他一脸严肃，劈头问道：

“老吴，你听见了消息没有？”

“什么消息？”

“日本关东军侵占了沈阳！”

“报上没有登。”我大吃一惊，将信将疑地追问下去。

“是的，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变。日军已占领北大营和兵工厂，

消息确实可靠。”这位同学是从东北大学转到燕京大学来的，对东北情形相当熟悉，他得来的有关东北的消息使人不能不信。我象被浇了一头凉水，对什么汝窑花瓶，配得恰好的乌木座子，全失去了兴趣，匆匆赶回东城大羊仪宾胡同二十九号，对家兄（吴其昌）说了，大家一肚子气愤。他忍耐不住，自己出去打听消息了，也没回来吃夜饭，几乎到半夜才回家。传来的消息不一：有的说日军不战而占沈阳，有的说巷战很激烈，但北大营和军火库被日军先占了，只好退出。不论其他消息如何，总之沈阳被日军侵占这一点似乎是确定的。以后又陆续从各处透露出来的消息，说是我军没有抵抗，日军未费一枪一弹而占沈阳，又扩大占区，全部占领沈阳附近的重要据点。

沈阳当时是东三省的首府，本来是张作霖割据的地盘。张作霖于一九二八年六月自北京退出回沈阳时，在离沈不远的皇姑屯被日军预埋在铁路下的定时炸弹炸死。张作霖死后，东北政权由其长子张学良继承。这位“少帅”和日本关东军是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的。但论实力，他远远不是日军的手。日本关东军驻守东北主要交通线，名为保护南满铁路，实际上是东北的太上皇，经常向张学良提出侵害我国主权的无理要求。张学良无力拒绝，也不愿答应，只好敷衍、搪塞、拖延、躲避了事。关东军对于张学良这种态度当然不满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动之前，张学良在北平。他的大部分军队在关内，所以沈阳相当空虚，也无人坐镇。

张学良之所以离沈阳而来北平，也可以说是上了蒋介石的当。蒋介石从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后，继续“北伐”。但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，他的“国民革命军”抵济南时，遭到日本驻军的阻

挠，发生了“五·三”济南惨案，无辜市民被日军屠杀者数百人。日本在济南本无驻军，但为了阻止蒋介石的军队北进，遂以“保护日侨”为名，从青岛调动日军到济南。日军阻止了国民党军由津浦路进取京津的行动，国民党军派到日军中去的外交人员蔡公时，竟被日军残酷地肢解而死。国民党军于是改由京汉路自汉口经河南、石家庄规取北京（彼时尚未改称“北平”），但阎锡山的军队乘机从山西抢先开到北京，又阻止了蒋攫取京津，因此引起了后来一九三〇年的阎冯对蒋的中原大战。这场战争持续了半年多，不分胜负。山西军在一九三〇年攻克济南，直趋徐州，国民党军渐难支持下去。在此形势下，蒋派到东北去的吴铁城说服了张学良，东北军遂沿传统的路线经锦州入山海关，使阎冯军队腹背受敌。阎锡山只好退回山西老家。冯玉祥则照例“下野”。蒋介石为酬报张学良进军关内驱走阎冯军队之功，封他为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”。他的部下遂不再称他为“少帅”，而称他的新尊号“副座”（当时称蒋为“委座”）。

张学良及其部下一进北京，五百年故都的文物风光当然是沈阳远远比不上的。蒋介石既然委他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，其分会就设在北平，张的公馆则设在顺承王府（即今全国政协所在地）。蒋介石对张实行羁縻政策，把张稳住在北京，既减少了张回沈阳经营东北以致养成割据势力的顾虑，又可以直接和东北的各派势力挂钩，使他们直接效忠于南京。日本对于张氏父子和其各派势力是有能力控制的。南京政府如果觊觎这一块就在它口头的肥肉，关东军是不能容忍的。

蒋介石在击退阎冯的联合势力，借张学良东北军之力“收复”平津以后，俨然有“汜可小康”的形势。但他因连年用兵，不注意

长江水利工程，这一年(一九三一年)夏天长江大水灾，汉口街道上多用船只作为交通工具，附近有的县则沉在水底，估计死人以百万计。当时全国正呼吁救灾，长江水势尚未退尽，幸灾乐祸的日本侵略军，就乘此时发动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攻入沈阳，遂成为以后持续十四年之久的中日战争的起点。

九月中旬的北平，正是雨季已过，溽暑初退，天高气爽，不寒不热的好天气。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以后，改北京为“北平”，意谓北方从此被它平定。于是从北京伸展出去的各条铁路，本来定名为“京汉”、“京绥”、“京沪”，一律被国民党政府改为“平汉”、“平绥”、“平沪”。但到东北去的“京奉”路，因不再用“奉天”旧名，照例要改为“平辽”。张学良不愿为蒋所“平”，就改称“北宁”。

北京改为北平以后，已不是政治中心，也没有象样的工商业，赖以支持的只有一些学校和其他文化机关，如两个国立研究院(北平研究院、中央研究院)、不少图书馆、科学调查所(静生生物调查所、地质调查所)、故宫等博物院。因为没有“甚嚣尘上”的政治风波，环境安静，是读书和做科研工作的理想城市。所以北平变成了全国的文化首都。这里不但有全国最老最多的大学，而且也是文化水平、科学水平最高的大学集中地。许多南方的学生都到北平来念书。并且，由于“五四”运动的深远影响，北平的学生虽然远离政治中心的南京，在沉静的科研环境中，却并没有忘怀自己苦难的祖国。尔后的各次爱国运动都由北平学生领导发动，即足以证明这一点。

清爽的九月，正当各校开学时节，也是最理想的读书天气。但文化首都北平的沉静的读书空气，并不能永久保持下去。

一九二八年秋，我同时考入清华大学西洋语文系和燕京大学

英文系。清华大学因当时国民党各派争夺校长，推迟开学，我只好先进了燕大。按当时学制，除医科外，各系都是四年毕业。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年是我的最后一个学年，也是最吃紧的一年。尤其是因为我选定了毕业的学士论文为《吕恰慈的文艺批评学说》，而此文的英文读起来实在别扭。过去我学英文系并不专心（因此系教师都由原先的美国传教士充任，水平不高），常到别系去听课，耗费了不少时间。现在到最后一年，非下决心用功不可了。但是我的决心被沈阳来的消息破坏了！敌人已经破门而入，怎么还能安心读书！

二、燕大成立学生抗日会

星期一早上，我回到燕大。大家一如过去学期伊始时那样，正紧张地进出图书馆或课堂。未名湖畔的秋柳，还象往常一样悠悠扬扬，万缕千条拂石船，好象整个燕大还没有听到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消息。

我找了两张大白纸、一瓶墨汁（这些文具是学生会常备的），也不起草，提笔就写了一张带有“煽动性”的《告全体同学书》，一式两份，一份贴在图书馆前的布告牌上，一份贴在第一宿舍（现在的德斋）入口处的布告牌上。我批评了有些同学对国事毫不关心，也批评了有些绅士式教授，“只要三百元薪金无恙，一家子人口平安，国家亡了也不关痛痒”的观点。我说：“国家亡了，只要有志士仁人，还是可以复兴的。哀莫大于心死！所谓士大夫阶层对国事如楚人视秦人之肥瘠，这才是最大的耻！耻！耻！”末了，我呼吁同学们起来，采取行动，“赞成者请签名”。不久即有许多人围着签名。

我旋又溜到清华去看看情形。那里也是冷冷清清的不见动静。回校时将近午饭时间，图书馆里散出来的同学在看《告全体同学书》。也有人就在这张大纸的边上写些小字，表示赞成或反对书中的“煽动”。不到两天，报上消息也已传开。全校沸腾起来了，许多同学纷纷贴出“公开信”，要求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大会讨论局势。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大多数是国民党，和校方关系搞得不坏。学生自治会是全校同学选举的，抗日行动理应由它进行组织。但事变以来近半个月，却毫无作为（除了“停止娱乐”及臂带黑纱）。同学要求召开全体大会，另组抗日委员会。学生自治会遂不得不于十月初召集全体大会。

大会是由学生自治会召集的。以前学生自治会也召集过别的会议，讨论有关全体学生的事情。但燕大学生的自由主义特别严重，除了读书玩乐，对别的公共事情大都不感兴趣，因此，开会常因“不足法定人数”而“流会”（开不成）。可是这次全体大会，同学们都踊跃参加，大礼堂中八百个座位早已坐满，连两边窗台上也都坐满了人。开会时群情愤激，大家慷慨陈词，有的同学提议立即罢课游行，反对“不抵抗”政策（当时以为张学良知道日军要发动战争，下令不抵抗而撤退）。但也有国民党的稳健分子主张“慎重”，“爱国不忘读书”，反对罢课游行。大会结果，否决了由当时掌权的学生自治会主持抗日工作的提案，另行组织由全体大会直接自由提名选举出来的学生抗日会。当时决定选举抗日委员十一人，以得票最多者为主席。选举结果（假如我没有记错）如下：吴世昌、杨绛（女，即杨刚）、张德生、史国雅、董文田、卢惠卿（女）、周振光、刘纪华（女）、谭海英（女）、叶楚生（女）等任委员，其中吴世昌任主席。大会并通过以下议案：下一个星期某

日罢课游行，借以唤起民众，抗议日寇侵略我领土，同时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御侮，并罢免不抵抗的封疆大吏，处之以丧失国土罪（当时尚不知道张学良是奉蒋介石之命不抵抗日军的），以及要求政府全力抗战等。

三、第一次抗日游行

全体学生大会议决案中别的还都不成问题，唯有罢课游行一项是燕大当局所不能容许的。因为燕大自建校以来，素以“学风纯正”著称，从来不曾有过罢课游行等“不轨行为”。所以，达官贵人、军阀富商的子女，都被送到燕大来“好好念书”。当时教务长司徒雷登^①正在美国筹募燕大经费（因自一九二九年美国经济萧条以后，燕大经费来源大减），如有重大校务则临时组织一个委员会处理，由年高德劭、素称谨厚的教育系主任高厚德（Gallit）代理教务长。校务委员会听说学生要罢课游行，立即召集紧急会议讨论此事，并通知我代表学生抗日会列席此会，报告学生全体大会开会及决议经过。其实学生开大会时，学校当局早已派人参加听信，备知一切，要我汇报无非是要留下一个正式记录，以便以后引用时可以说：据学生抗日会主席某某报告云云。同时校务委员也可以借此机会向我提出问题。到会的校务委员，除文、理、法三院院长、各系主任外，也包括一些美国教授。他们虽不赞成罢课游行，但对于学生的爱国情绪都表示同情和理解。只有一个例外，那是经济系讲师、代理法学院院长陈其田。别人提

^① 司徒雷登本为燕大校长，英文名称为 President，后因国民政府不许外国人为大学校长，乃聘前清翰林吴雷川为校长，译名 Chancellor，司徒仍保持英语原称，中文则译称教务长。

问时都站直身躯，用严肃而和善的口气发言，有时也表示为学生的困难考虑问题。唯独陈其田，欲站不站，把身子斜靠在桌上，用极端轻蔑鄙夷的口吻，歪着嘴巴问我道：

“你们昨天的会到了几个人呀？够不够法定人数呀？这样的会算不算合法呀？对全校学生有约束力吗？赞成罢课游行的有几票？这些赞成票中，有多少是你们布置好的？”

这显然是存心侮辱，以小人之心度八百多青年之腹。他说话时那种鄙夷的神气，连别的教授都不自觉地对他侧目而视。

我说：“陈先生所提的都是学生团体内部的问题，不是今天校务会议所要知道、所要讨论的问题。陈先生没有资格问我这些问题，我也没有义务回答他。不过他既然提出来了，我不说好象我理亏，所以不妨说几点：第一，昨天大会到会的人数，不是几个人看见，而是上千人共见的。够不够法定人数，他可问任何人，不必在这个会中提此问题（有的美籍教授点头）。第二，每一件提案表决时票数的多少，够不够法定票数，大会文书处自有记录。陈先生如要去查核，他随时可以去查，一个人去可以，带了律师去也可以。第三，陈先生所谓‘事先布置’的问题，谁都看见，这个全体大会本来是由学生自治会召集的。他们事先有无布置，陈先生可以去问学生自治会负责人。后来到会同学临时动议另外成立抗日会，临时提名选举，这些手续都是坐在主席台上的学生自治会职员办的。我们被选为抗日委员的都四散坐在台下，有一半被选的人直到选出时我还不认识，因为不是和我同系或同班的，素无来往。有无‘布置’问题我说不上来，还是请陈先生去问召集大会的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吧。”

我一说完，陈其田拿起帽子就走。以后对学生的抗日活动，